



革命故事小丛书

大風暴之歌

姬兆生口述 周驥良整理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革命故事小丛书

大风暴之歌

姬兆生口述
周骥良整理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1959年·北京

统一书号：10009·431

定价一角六分

1924年是我从乡下来到天津的第四年，也是我在宝成紗厂（現天津国棉三厂）做工受剝削的第四年了。这四年啊，熬的我这23岁的壮小伙子，活象个小老头似的，几天也露不出一个笑脸。

这天，刚进秋的季节。我的好朋友，搖紗車間的伙伴，山东同乡董兆义，他上班来，兴冲冲地跟我說：

“喂，大哥，你愿意上学不？”

“上学！我的天，咱們这些臭工人，穷棒子，还有上学的份？”

“看看，你不信是不是？不单能上学，人家老师还一个錢不要，白教哩。”

噢！真的？这不是从天上掉餡餅嗎？会有这么好的事？我不信。可是，老董这人老实巴交，又不是个好开玩笑的人。

“今天，咱們下了班，看看去。人家叫我給介紹学生哪。”

“在哪儿？”

“就在咱厂子外头，新盖的房，貼着紙条。”

这天下工了，我就跟着老董去了。果然在一家門口貼着个紙条。老董比我强，大字識得几个，就指着紙条念給我听：

“这不是嗎，‘貧民學校’，專教工人，不教別人。”

門虛掩着。用手輕輕一推就開了。嘴，是獨門獨院，新磚房，一間房帶一個大尾巴，三角形的怪屋子。房門口正站着一个人，他就朝我們打招呼：“來吧，請進來坐坐吧。”

我們這些汗珠子掉地下摔八瓣的工人，在北洋軍閥時代，哪還算個人呀？誰見了誰都躲着走。誰用正眼瞧我們？更不用說讓人這麼歡迎了。既然人家歡迎，能不進去么？我們進去了，在屋里落坐。人家還給送了两杯熱茶過來。

老董就朝我說：“這是李培良李先生。”又朝李先生說：“這是姬兆生。”

李先生這人，一看就知道，是學生出身，文明人的派頭。細高個，長圓臉，溜光光的分頭。我看他，他也看我。他笑着，用一嘴的天津口音問我：

“做什么工啊？干了几年了？”

“熬了四年啦。搖紗。”

“識字嗎？”

我有点臉紅，晃了晃腦袋。

“不識字還行啊？不識字就要吃他們的亏。你一月搖多少紗呀？你一個月明明做了一百個，他們要是故意少記幾個，算你八十，你看得出来嗎？明明應該關你五元錢，他們要是只關你三塊，你知道嗎？哪兒找去！要是識字，應該是多少，寫的是多少，你都看的清清楚楚，他們少你的就不行了。他們會少給你錢，你信不信？”

我成天在車間干活，資本家和工頭的那套連蒙帶騙的手

法，还不明白么？我点点头，說：“不光少給錢，还鬧工哪。”

“我說的对，是不是？还是職字吧。怎么样，天天来学习吧？”

我皺了皺眉。“上夜班，沒工夫啊。”

“下了夜班，一早就到我这儿来。学完了，再回去睡觉。要是下白班；你就吃完飯来。什么时候来都行。”

看人家这么热心，我还发什么怯呢。就說：“謝謝李先生，你太好了。头一回遇見你这么好的人。”

“怎么，过去沒遇見過好人？你从先干嘛呀？”

一勾起我小时候受罪的事，我就連着咳了几声。說：

“別提了。記不清是从哪一年起，反正，打一記事就記得是老少三輩給地主家扛活。跟着奶奶、媽媽伸手向人要飯吃，到处嚷着，‘行善的大叔大孀呀，給一口吃吧。’到冬天，穷得連条褲子都沒得穿。”

李先生靜靜地望着我，問：“那你是怎么到天津来的？”

“咳！”我又叹了一口气。“大点了，給地主做小活，白天放牲口，晚上还得推半夜磨。起早睡晚，一年到头，你猜掙多少錢呀？才掙两吊錢！有天晚上，我推磨推得实在乏了，沒留神，把地主家一口破罐給砸了。嗨，地主抓住理了，非賠罐不可。硬把一年的工錢都給折成破罐的錢了。我一賭气，不干了。要飯也比給他干活强。后来，我就要飯到天津找姐姐来了。”

“噢！这样来的。不易啊！”

我窩着一肚子气，嗓門越来越大了：“什么易不易的？我

工厂不也是受气嗎。动不动都是錯。……”

我的话多起来了，老董拉了我一把。“老姬啊，別說了，咱們該回家吃飯了。”

我这才停住。心里的話吐出来，可痛快了。还不想走。

李培良就囑咐我們：“咱們都認識了。你們倆明天一块来吧。”

我們这才出来。一出門，老董問我：

“大哥，我不騙你吧？人家是好人吧？”

我点点头。从这天起，我和老董一样，被李培良給吸引住了，打心眼里乐意接近他。

第二天一下班，我們又去了。說实在的，我的学习劲头并不大，就是喜欢他这个人。李培良把我們当朋友看，也沒教我們識字。弄了壶茶，我們一边喝着，一边聊了起来。他这人不好說，却好問，淨問我們工厂里的事。“你們說說，你們工厂打人么？罰人工錢么？开除工人么？”

一提到这些事，我心里窝着的話，都向外倒出来：“打人罰人那是家常便飯。”

“罰多少？”

老董就指着我說：“前几天，还罰了他伍角錢。”

“要是罰两角錢，那第二天就得白干。不光白干，連飯也饒在里头了。”接着又問我：“罰你五角，那不是两天半都白干嗎？”

我气大啦，这明明是工头搶錢嘛，就說：“可不，两天半都白干。把人气得飯都吃不下。”

“凭什么白干呢？想法子呀。”

“咳，有什么法子。让人家捏住嗓子眼，这就是没办法的事。”

李培良談到这儿，把話往岔处引，就問：“咱們宝成厂，都是哪地方的人多？”

我們俩算了算，“唔，我們厂子有这么几帮子人，河南帮，上海帮……。”随后，我还叹气，嫌我們山东人太少。

“要是你們山东人多呢？”他問。

我說：“要是人多，我們老乡抱团。欺負我們，就揍他們。”

“其实，都是工人，何必要同乡才抱团呢？”不过，說到这里，他又不說了，还是听我們的。

人恋人，馬恋群。我們是一見如故。以后，只要一下班就往他这里跑。要說，李培良这人工作做得确实是好，有修养，有耐性，待人又謙虛，又誠实，能把話說到人心窝里，能團結住人。

一晃，几个月过去了。要說識字念書的話，頂多頂多，也就学过一回，念的是：“先生教学生，学生教先生；大笔写大字，小笔写小字。”

“念这个多不带劲啊！”我說，“老李啊，还是談心吧。”

熟了，自自然然的摸出一套規律。經常，李培良要到上边“租界地”里去。他一走，就把家交給我們。我們也就象在自己家里一样，在这里聊天呀，喝茶呀，下棋呀。“貧民学校”成了我們的俱乐部。

有回，李培良从上边回来，愁眉苦臉的样子，說：“照現在这样子，我要走了。”

一听这话，我們俩可舍不得，都说：“你别走啊，咱們处得挺好的。”

“那你們二位，倒是給我招學生啊。我是办学校来的。”

我說：“学生有的是，你屋子装得下么？”

“那不要紧，我有办法。”

“那你放心，准有学生。”

我們俩在各車間里这么一宣传，一下子，“貧民学校”挤滿了人，开了两个班。學員一多，事情也多了，人都是我們俩介紹来的，我們俩能不給帮忙么？渐渐，“貧民学校”不是老李一个人在办，成了我們三个人的事了。有了这点事，更是占心，一下班，走来都嫌慢了，总是跑着来。

識字班搞的很热火。居然还有人來參觀，慰問。来的是两位学生，一个叫安幸生，一个叫李希逸。李培良向大家介紹，說他們是天津的学生代表。

其实，他俩是朝我倆来的。当时已經把我和老董当成党的培养对象了。所以，參觀完了以后，他們沒有就走，和我們聊起来。还特地問我們：“你們天天来学习，厂里注意么？”

我說：“不要紧，我們不往外嚷嚷。”

工作开展起来了。李培良光是教書和談話，就忙得招架不过来，顧不上做飯。吃飯成了問題。他和我商量：“老姬呀，你給找个大師傅吧。做飯帶看家，只要一个条件，人可靠，能够心換心，嘴皮子不乱說乱道就行。”

“咳，老李，你放心好了。决出不了錯，我的老乡都是穷棒子，老实人。”

有天晚上。老李从两班學員里挑了那么二十来位，开了一次特別会。他在黑板上写了个“工”字，随后指着这个字問我們：“你們看这‘工’字。上面一杠子，下面又是一杠子，把咱們正夾在中間，上不着天，下不着地，悬在中間，提心吊胆，光受罪了。”

大家一听，这字解释的真妙。都唉声叹气的說：“可不嗎，咱們工人讓他們压在中間了。”

“咱們別讓他們压在中間，出来不行么？难道就一点办法沒有？”

有人說：“有什么法子呀？讓人当懂話的牲口使喚着。”

“法子多了。咱們要是組織起工会，不就不受制了么？”

又有人說，“組織工会。那資本家还要咱呀？非开除不可。”

李培良就笑：“你看，你們还是害怕不是？要是組織好了，他們就不敢了。咱們打个比方：一根筷子，一折就断；一把筷子，任你怎么折也折不断。一根秫秸，也是一折就断，要是一捆秫秸，鉄錘砸也砸不断它。人也是这样，三两人办事，孤掌难鳴，要是上百上千，人多势众，那就不同了。只要咱們組織起来，叫他罰，叫他打，叫他开除，他也不敢了。”

还有人說：“理是这么个理。可是誰敢呀！厂里的資本家可厉害了。”

“你看看，要是不厉害，还和你們說这些干嘛呀？正因为他厉害，所以咱們才非要組織起来不可呢。”

大家都点点头，讓老李这一課給說服了。他說：“这样吧，

大家先回去想一想。”

我回去，躺到炕上一想：这不是明摆着的嘛，搞吧，反正迟早是漏子。不搞吧，难道这百十来斤肉，就让人家这么拉着卖。等老了，干活支不起腰来的时候，再要饭回家等死吗？

干？还是不干？心里憋得慌。好不容易熬到下班的时候，连忙去找李培良，个别谈谈。

老李没跟我谈这些。另插一杠子，忽然问我：“你是山东哪儿的人啊？鄒县的？你多大岁数？姐夫叫什么名字？……”

我有点奇怪：“你问这些干嘛呀？不是说过了吗？”

“不干嘛，就是问问。”

我告诉了他。还眼睁睁地看他写在一张纸条上。转天，他就又到租界地去了。

这次回来，他出了新招。嫌学校里说话不安静，把我找到漫野开洼地来。

“有嘛事呀？这么机密。”我说。

“要紧事。咱们要搞工会，必须要有领导。有了领导，就好办了。”

“谁领导？”

他说：“共产党领导。不过，党是怎么回事，你可不能说。连爹娘都不能说。能保守秘密吗？”

我顿时浑身一阵滚热，急着说道：“你快说吧，还有什么不放心的。我不说，谁也不说。你放心好了，比打铁封条还牢靠。”

李培良给我讲了党的事，喜得我心里开了花。就这样，我

入了党。

2

入党以后，党給我和老董的任务是：把宝成紗厂的工会組織起来。

那年月，一提“工会”这字眼，就跟提“共产党”差不多，弄不好，就得把脑袋掰給人家。所以，我們組織工会是暗地里来。偷偷地找人家問：“咱們組織工会你加入不？加入了咱們力量就大啦。”我們找那最可靠的人問起，那些狗腿子，在帮的，在道門的，我們一律甩在外面。并且是三个人一个小组。到轉年春天，四月左右，我們工会就算已經組成了。全厂有百分之八十的工人参加了工会。只是工会还不能公开。

李培良和我們說：“独木不成林，光你們宝成厂还不行，咱們还得把別的厂子弄起来，那才是一股地动山搖的力量哪。”

我們都說这话对。

过了几天。我記得是个礼拜六的日子，李培良說，“今天，咱們开一个会，有几个厂子的工人代表来。”

“什么会呀？”我問。

到这时候，李培良才把地下組織情况約略和我說了說。原来党組織分头抓各工厂，“貧民学校”也不单是老李这儿独一份。別地方也都搞起来了，現在需要总的往一起碰。准备成立天津紡織工会。

我听了以后，又惊又喜，敢情各个厂子都組織起工会来

了，不是我們这儿单干哪。

老李說：“还是那句話，一根藕秸容易断，一捆就不容易断，要是几捆，几十捆呢，那就頂大事了，还能堵坝盖房呢。工人团结一家，在会上講講，老姬。”

我的脑袋一下子涨大了，“我不会講呀。”

“不会講不要紧。一講就会了。”

我心跳的通通的。哪有那么容易？不大会儿，河面几个厂的工人代表都来了。那时候，天津市只有六家大紗厂，裕元、华新、裕大、宝成、恆源、北洋。这一回，除了“裕大”是日商厂子，情况复杂，我們先撘了一撘，其余的厂子都有代表来。在河西那边办“貧民学校”的叫卢紹亭，这人圓圓脸子，架一副眼鏡，也是个学生，他也来了。

李培良催我說：“开会吧。”

我們都是大眼对小眼，沒开过这种会呀。

李培良又給出主意，“你們大家先介紹介紹。”

我們就挨个站起来，介紹自己。介紹完了，大家坐得挺挺的，还是沒話說。李培良就用眼盯住我。那意思是：“你倒是說呀。”

不說也不行了。我硬着头皮站起来，說：“我們工会已經組織起来了。咱們工人是一家人。以后咱們几个厂子加强团结，多联系。咱們是万人一条心，刀砍砍不断，水冲冲不垮。”

我坐下来，淨臉紅了。可是，想不到大家却一股劲儿給我鼓掌。以后，打开話匣子都說了。这个說，“咱們要齐心协力。”那个說，“今天咱們屋里說話，明天咱們得院里講去。”大

家也沒想什么辭句，可想的都是一樣。都是耍手拉手，一齊干。

隨後，選代表了。想不到，竟把我選成了全市紡織工會代表。“北洋”廠楊寶如做副代表。

等散了會，別瞧肉沒多一塊，只是心里這股勁可兩樣了，好象凭空長了幾分力氣，胆子更壯了。我登時就想，“廠里才有百分之八十的工人加入工會，這算什么？得百分之百呀。”

我們繼續擴大工會組織，凡是能夠挑出檢出的人，我們就吸收他們入會。

我們把工會工作也抓起來，拍胸脯跟大伙說：“有什麼事，找咱們自己的組織來談。”

一看工會真頂事，那些拜盟兄弟的，搞小圈子、知心朋友哥兒的人們都隨過來了。

這樣一來，我們可吃不了兜着走吧！哪干的下活呀？陸續不斷，總是有人來找，說是：“姬代表，這事你看怎麼辦？”要不，就說：“老姬呀，你快到我們那兒去。”我成天在車間里轉，顧不上干活了。

到月底關錢的時候，可傻眼了！半个月才拿到一塊來錢。過去，半个月，怎麼也能對付四塊錢。偏這時候，我爹，我弟弟都奔我來了。他們在鄉下混不上吃，混不上穿的，滿以為我做了工人，有吃有穿呢。哪想到我才关了這麼點錢，別說吃飯了，喝湯也不夠呀！

我把錢拿回姐姐家去。只好賴着臉皮吃姐夫和姐姐的。我姐夫一看我拿了這幾個錢回來，那臉子可不好看，冷冷的，

真能把热鍋給冻成冰山。他是日商裕大紗厂的工人，要說受气，比我們还多受了一层，可他这人就是不轉脑筋，逆来順受，老老实实干活。

我坐在炕边上，低着头，刚把飯碗端起来，我姐夫可不饒人，指着他自己的亲兄弟，拿話拍打我。他嚷道：

“你干了多少活啊？不好好干，指什么吃飯呀？‘搗蛋的蚂蚱’整天瞎蹦跶什么呀？”

我这人有气性。这两句話能装得下么？飯怎么往肚里咽？勉强塞了两口，扭头就走。姐姐就說，“大兄弟，你怎么不吃饭啊？”

“吃饱啦。”我說。

“那么大的人，吃这么一口就饱了？”

“我吃不下呀。”

我三步并成两步，迈到老李那儿。一瞧見他，禁不住两眶眼泪，掉了下来。我說：“搞工会，再累咱也不怕。这闲气实在难受。”

“算啦，”老李就說，“咱們这些人連命都頂在脑門子上，还在乎这些干嘛。来，我正等你。”

我一口气，咕嘟了一碗热茶，鬧了个水飽。就問：“找我干嘛？”

老李就說：“我从‘上边’回来。你知道吗？上海日本紗厂的鬼子开枪打死了咱們一个工人顧正紅。党委决定要在最近搞一次全市大游行，把群众反帝国主义、反封建势力的情緒掀起来。动员动员大家看。咱們工人是一家，不能袖手旁觀。”

“游行”这两字，还是头一回听说，我登时应承下来，“行啊，咱们工人含糊不了。”

我马上到厂，召开工会会议。朝各科工会支部的代表说了，支部代表和小组长说，小组长就和工人说。原先我还有些担心，怕工人们嫌累，不愿意去。等第二天，各小组把情况汇报上来。所有小组都是一个意见：说是工人老早就应该上街。

游行是秘密进行的。我们做了安排，人们分成三个五个，十个八个的分头过河入市。集合地点是南开操场，要十点鐘到齐。我们还赶制了一面工会大旗，分开来拿。有人单拿竹竿，有人单拿剪字。我是拿旗布的，把它围在围腰里。

南开操场，那年月还很空旷，但是，去的人很多，挤了个满满的。各个厂子都把大旗亮出来了，纱厂，地毯厂，海员……差不多的行业都组织起来了。看了以后，真让人高兴。我们也把旗子打出来，是：“天津市宝成纺织工会”。我守在旗子前头，插腰一站。

大会把标语口号发下来了，还每人给一根葦子棍，粘上一张三角纸。口号是：

“打倒帝国主义！”

“收回铁路矿山！”

“取消二十一条！”

“不买日本货，不卖日本货。”

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！”

等到大家把旗拿好，场子中间迭起两张桌子，有一个学生

爬到桌子上，用喇叭筒朝大家喊話。他講的是“工學聯盟，團結一起”的話，現在我還記得清清楚楚。

講話很短。因為我們提防不要讓官面上的人把我們堵在操場里。所以很快就開始了遊行。八個人一排。學生是第一大隊，我們工人是第二大隊。大家舉着紅紅綠綠的小旗，喊着口號，順大馬路走了下去。由南馬路拐向東南角。沿路警察不少，他們從來沒有見過這麼聲勢浩大的遊行隊伍，竟看呆了，不敢管我們。到東南角，在日租界的入口處，喊的更厲害，日本鬼子也躲開了。隊伍順官銀號過金鋼橋，最後到天緯路解散。這是一次勝利的遊行。

等我回到廠子，已經是傍晚黑的时候了。一天沒吃沒喝，一身是汗，也沒住腳，立刻趕到學校來。老李也剛回來。我們幾個人照了一面：“沒出什麼事吧？”“沒出什麼事。”隨後，大家都樂了起來。

第二天，各小組把群眾的反映匯報上來。沒想到，群眾的反映却是這樣：“遊行有麻勁！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到日本租界喊去。叫小日本瞪眼听着；那才棒呢。”

我說：“你們小組長怎麼不給解釋解釋呢？要是闖進日本租界，鬼子不得開槍嗎？要死人的。”

有位支部代表說：“我們早這樣說過啦。大家才不聽這一套呢，說是那有嚇，壓迫咱是死，拿槍打，不也是死嗎？”

看看，群眾起來了，勁頭够多沖？晚上，我把情況向老李匯報。李培良听了，就問我：“到底是闖，還是不闖？你說呢？”

我說：“咳，死有什麼。活着不也是讓資本家給夾在中間